

《人类简史》引发跟风潮，山寨书坑了谁

专家提醒：盲目蹭市场热度，将稀释图书品牌原创力

■本报记者 许畅

上个周末，知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首次来沪公开演讲，对人工智能等前瞻话题侃侃而谈。作为全球现象级畅销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的作者，善于观察人类未来的赫拉利可能万万没想到，国内有本作者署名“亚特伍德”的同名书《人类简史》，近期又被挖了出来。

此前不少读者冲着前者的名头，被误导买下“跟风版”后才发现，这本书在“书名标题和封面设计上极其雷同，但内容还不如网络百科加中学课本”，引发不少“差评”。图书市场的“打擦边球”跟风乱象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引发了新一轮对“跟风书”“山寨书”的批评。

在图书市场，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某一本书走红畅销后，市面上随即会出现书名、封面高度相似的“双胞胎”“多胞胎”图书，不少读者对原版与“山寨版”无所适从，难辨真伪。尤其是社科类畅销书，一旦书名及书中话题

制造出传播热度，就容易引来一些出版商模仿乃至全盘“复制”热门图书的版式或内容框架，成了“跟风伪书”的高发区。

在业内看来，无底线搭热门图书的顺风车，折射了部分出版人唯利是图、对知识产权品牌的漠视。比起图书市场上的纯盗版不规范行为，盲目跟风蹭热度的“山寨书”更是一种低劣的创意抄袭行为，侵犯了原著的创意，也丧失了对文化创新应有的追求精神，在误导读者的同时，也扰乱了图书市场的秩序。

书名封面高度雷同，“跟风”之风几时休

据悉，中信出版社引进赫拉利著作版权后，分别于2014年、2017年印行了两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文简体版，目前已累计发行约200万册。而跟风版《人类简史》去年6月出版后，还曾和原版出现在电商同一页面或相邻位置上，近期被媒体频繁曝光后，有消息传该书“已下架”。记者昨天再次

登录亚马逊、当当等图书电商平台，在搜索栏键入“人类简史”，跳出来的基本是中信出版社引进版书，但耐人寻味的是，换一个搜索词“亚特伍德”，跟风版却赫然在列，依旧可进行购买。

由于书名主标题一样，副标题的英文也仅一词之差，版式分布接近，不少读者买书后“大呼上当”。据网友吐槽，跟风版《人类简史》讲述南方古猿、尼德兰革命等段落时，大段抄袭或改写百科内容，基本可视作“洗稿”之作；作为历史读物，全书鲜少史料考证和注释，参考书目简单罗列了几本国外史学书的中译本，其中甚至还包括赫拉利《人类简史》。跟风版不仅将作者“亚特伍德”冠以同赫拉利一样的“新锐历史学家”标签，且不顾豆瓣2.5分的差评，自称“万千读者口碑推荐”。有业内人士透露，在它的背后，职业写手“攒书”、相关利益机构代为发行、买卖书号、“刷榜”等违规操作可见一斑，跟风版《人类简史》至少也印了四五万册，获利颇为可观。

也有人认为，《人类简史》又不是注册

商标，目前还有梅朝荣版、房龙版，后来者有所借鉴也属正常。“那么，“借鉴”或“致敬”之名，能否站得住脚？

在中信出版集团首席运营官卢俊看来，许多跟风性“山寨书”说到底是一种低劣创意抄袭，它是市场效率导向的体现，因此，法律和制度层面用怎样的尺度来规范市场就尤为重要。“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能力。创意输出与图书策划能达到什么水准，检验着出版方的能力和节操。”

山寨书缺少对原创的敬畏，更谈不上文化艺术的原创力

《人类简史》被“跟风”仅仅是一个案例。有学者直言，粗制滥造的“山寨书”，无论是“颜值”上的抄袭、抑或是“内容”上的拷贝，无不瞄准热门领域和话题，按畅销书的路数如法炮制，蚕食注意力的“流量泡沫”，欲从市场利润中分得一杯羹。但这对以优质内容安身立命的图书出版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言

而喻的，也稀释了优质图书的品牌。

中国出版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出版人说，畅销书就像夺目的明星IP，但一窝蜂的后续开发，并不一定有效果，同名同类书蜂拥而上，更多是泥沙俱下，倒了读者胃口。比如，尹建莉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火了之后，五花八门的“姊妹版”育儿书接踵而来，涌现了一大波“低仿”版书名，如《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大全集》《好妈妈胜过好医生》《好妈妈真是好老师》《好爸爸胜过好老师》，令人啼笑皆非；N种书名相近的“一本书读懂xx史”频繁轰炸着读者神经；企鹅引进版图书的封面艺术设计颇受好评，结果没多久市场上便有多种形似品种干扰视线……

有编辑不禁发问：出版业的乐趣与源泉是什么？就是要不断发现、挖掘并推出优质文化内容，而山寨书光以畅销为目标，缺少精心策划，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敬畏，更谈不上文化艺术的原创力了。出版人应从阅读热潮中捕捉揣摩读者的细分渴求，而不是唯利是图钻市场的空子。



快评

比马奶酒和弯刀骑射更醉人

——有感于上海夏季音乐节 MISA 舞台上谭盾、杭盖与上交的成功“合体”

孙慧



前晚，指挥家谭盾(左)“做媒”，携手中国摇滚乐队杭盖(右)与上海交响乐团，为本届 MISA 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交响乐音乐会。



郑国章摄

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进入第八个年头，已然成为沪上一块闪亮文化品牌——因其音乐会主题的跨界形式、偶像机制的引入以及横跨地域、年代的音乐类型，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前来。按区域不对号入座的进场方式，也与夏日轻松自如的格调尤为吻合，在烈日里透出一丝清新。

前晚，古典音乐创意大师谭盾携手当下国际舞台上颇有影响力的中国摇滚乐队杭盖与上海交响乐团，为本届 MISA 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交响乐。

成立于2004年的杭盖乐队来自内蒙古广阔的大草原，在骏马驰骋、雄鹰展翅的苍茫之地，悠扬高亢的长调赋予全新的生命力；七位乐队成员怀着对自然的信仰，将传统的民歌曲调糅于现代摇滚乐之中，开创了猛烈彪悍的草原新民乐之风。

而谭盾、杭盖与上交在本次 MISA 上的“合体”，是作曲家的又一大胆创意。在以演出严肃古典音乐为目的而进

行声场设计的场馆，让演唱摇滚曲风民歌的蒙古族汉子，与交响乐团进行了一次深入肺腑的喊话。杭盖成员身着宽厚的蒙古族长袍，立于舞台后方唱着狂野的歌词，深情的马头琴、神秘的呼麦催动电吉他、电贝司及架子鼓组成的摇滚战车，极富渗透力与感染力的音乐表现响彻全场。台前，在谭盾近似舞蹈的雀跃指挥中，平日里严谨克制、声部分明的古典乐队则转化为“大乐队”效果，以更加庞大的编制和声效带动了摇滚乐队能量级的提升。在此，民族艺术的美感得以无限放大，蒙古语歌词婉转悠长，极富动感的节奏力如巨大磁场，令人沉醉。

是夜，杭盖演唱了多首热门作品，皆由其与谭盾创作室为本场演出重新合作编曲而成。歌曲母体多脱胎自内蒙古民歌，《初升的太阳》歌唱对美好爱情的思忆，以动力性的节奏开场，交响乐队以波澜壮阔式的背景铺陈，铜管乐的高亢音色占有重要地位，中段则以苍凉

的马头琴与提琴声部的柔情对话徐徐展开，对比的张力催人泪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表达了牧民放声歌唱的幸福景象，交响乐队以轻松愉悦的交替低音为配器，中提琴则直接化身为主角尤克里里，被演奏者们抱在怀中扫弦弹奏，十分欢快。《波如来》《鸿雁》等乐队代表作的演唱同样激起观众的阵阵叫好，加演的《希格希日》由杭盖单独完成，曲中模仿了马儿奔跑的声音并由慢及快不断加速，人声、口弦、呼麦相互交替，主唱胡日查在台上耍起马鞭，热情的乐迷再也坐不住，起身一同雀跃，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音乐会同时演出了谭盾的两部乐队作品：低音提琴协奏曲《狼图腾》以同名小说为背景创作，由悉尼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亚内克斯·埃内里担纲独奏，借狼与自然的关系引出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作曲家利用低音提琴不同音区的音色性格表现多种自然场景，乐队低音提琴以手掌拍击琴身，通过琴体的

庞大音箱共鸣出缓慢的节奏，与主奏低音提琴奏出的《嘎达梅林》旋律对话，如泣如诉。手机交响乐《风与鸟的密语》则需要观众预先在手机上下载一段时长52秒的微信语音，这段语音由管子、唢呐、笙、二胡等六件中国乐器模仿鸟儿叫声录制而成，由谭盾指挥所有人依次播放。配合乐队演奏，全场仿佛变为硕大的森林，其中布满鸣啼的鸟儿。这也是谭盾一直以来在践行的创意音乐作品之一，通过更多的观众互动大胆打破严肃音乐舞台的固有形式。

谭盾在台上坦言，这场音乐会不仅是杭盖与上交的对话，更是传统与未来、现实与梦想的对话。我想，这还是一场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一次自然与人性间的跨越与释放。在音乐厅里听民族摇滚是怎样的感觉？这是断裂之后的链接与重塑。当强劲的草原之风，迷人的民歌神韵与摇滚乐在一起，这碰撞征服了观众。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夏季音乐节”新思考

鼓励青少年谱写自由的音乐，挖掘其审美、创造、表达、想象能力

中国孩子谱“心乐”传递民族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演奏小提琴时揉弦和不揉弦，表现力有什么不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内，17岁的张乐扬向纽约爱乐的小提琴手卢冠星发问。“巴洛克时期的小提琴作品几乎不使用揉弦。”说罢，演奏家奏响一段巴赫的乐曲，并表演了有揉弦的版本。来自纽爱的三位乐手面对孩子们的问题有求必应，为家们展示了低音长号、小提琴和打击乐的音色、音域、表现技巧。

这是张乐扬第二次来参加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小作曲家工作坊了。去年7月，上海交响乐团引进纽爱持续了20多年的音乐教育品牌“小作曲家项目”，成功举办首届 MISA 小作曲家工作坊及作品音乐会。

在该项目创始人、纽爱前低音提琴副首席乔恩·迪克眼中，中国孩子起初有些害羞，但通过导师的激励，他们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思考，用惊人的创造力去谱写内心深处的心声。《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路漫漫》《精卫填海》《水乡夜色》《苏州河的四季》《梦江南》……今年参加工作坊的学生所写的曲目，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意蕴。好几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示，中华传统文化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天然联结，渴望通过西洋乐器传递出民族精神。

颠覆传统音乐课堂授课方式

今年，该计划继续由上交和纽爱联合策划，选出十名中小學生参加为期一周的集训，从音乐游戏互动与艺术家的交流中，挖掘其创作天赋。最终由孩子们创作的十部重要作品，日前已在 MISA 的舞台上公开首演。今年入选项目的孩子至少会演奏一门乐器，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懂得谱曲并在私下里进行过创作，不过其中有些人不曾受过专业的作曲训练。

除了纽爱演奏家，来自上交的乐手同时展示了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打击乐，女高音李薇薇也在课堂上展歌喉，使学生了解乐器和声乐的特点与记谱方式。小作曲家使用上述乐器及声乐配器，在七天里谱写出的新作，

正由上交乐手和李薇薇在工作坊作品首演音乐会上表演。

记者于工作坊现场观察到，导师们在正式授课前准备了热身游戏。比如迪克通过拍手展示变化丰富的节奏型，并让学生一起拍手，每人创作一个新的节奏型，不断叠加后组成长篇幅的乐句。导师还给了小作曲家“风暴”的主题，请他们在白板上尽情描画，共同创作出一幅作品。更有即兴表演课程，大家三五成组，拿教室中的任何物品来模拟生活场景。有人以谱架和黑板擦的摩擦与敲击声，模拟了乘电梯的过程。

导师之一、上海交响乐团教育拓展中心项目主管张毛弟告诉记者，工作坊会以尽可能丰富的内容，提供小作曲家构建音乐的全新方式。“项目的宗旨不仅在于教授孩子作曲技巧等理论知识，更致力于帮助他们找到创作灵感。”课堂中除设置让学生动起来的游戏以外，还会鼓励他们尽情提问或就“未来音乐的面貌”等问题畅所欲言。

中国有成为全球音乐教育领航者的巨大潜力

迪克表示，参加过“小作曲家项目”的孩子，在未来也许会成为音乐家，也可能成为警察、消防员、工程师等，不过无论从事哪个职业，从工作坊中学习的各种能力对他们都是有益的。

迄今为止，“小作曲家项目”已在全球40多个城市举办过活动。芬兰、委内瑞拉等地的音乐教育给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个孩子生来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潜能，工作坊并非简单地寓教于乐，而是希望深入激发他们的音乐审美力与创造力，锻炼其表达能力和想象力。”迪克说，“我们鼓励青少年从心出发创造自由的音乐，并在长大后也能保持这些可贵的品质。”

“中国有成为全球音乐教育领航者的巨大潜力，因为这里学音乐的孩子数量众多，家长非常重视，又具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迪克说，“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能注重传统音乐文化，并向西方音乐知识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漫长演出，《酗酒者莫非》日前在天津大剧院完成了首演。波兰导演陆帕来中国很多次了，他小火慢炖式的戏剧节奏，中国观众已经不感到陌生。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带着自己名满欧洲的作品来，而是直接拿中国作家的剧本，用中国的演员在本土排了一部话剧，整个创作过程耗时近一年。

新作《酗酒者莫非》的剧本来自中国已故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它从未在国内舞台上演。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导演，能理解史铁生先生的心事吗？陆帕以深厚的人文素养受人尊敬，他善于解剖人物的心灵，开发演员表演潜力，他又会如何展示他对史铁生的理解？这部话剧引发京沪乃至全国话剧界不少专业人士的关注。

著名导演林兆华说：“这只只有陆帕能排，我们没那么大的耐性。这是一点点抠出来的戏。”正是林兆华把史铁生的剧本介绍给了陆帕。

史铁生的本意是否被还原、被丰富？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前往天津

观看了演出。他认为，陆帕直接和中国作品、中国演员展开对话与合作，要比过去直接带一个戏来演更有意义，整个过程就像一面镜子，从中能够发现中外戏剧的异同与差异。在剧中，“影像和舞台构成了互文、对话，它丰富了史铁生剧本的想法，拓展了人物的内心空间”。对于影像与戏剧结合的效果，黄昌勇认为，陆帕做了一次充分的展示。

回到史铁生的原著《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来，它主要表述的是一个孤独的“酗酒者A”，在半醉半醒间，游走于现实和虚幻、过去和将来之间。一些学者倾向于定义它为未完成的剧本。史铁生本人曾幻想过“导演方法”，他在剧本中写道：“舞台的背景是一幅宽阔的银幕，放映机位于银幕背后。银幕前的舞台上演出戏剧，真正的剧中人只有一个——酗酒者A，

其余人多在银幕上，在电影里，或在A的台词中，他们对于A以及观众来说，都仅仅是幻影、梦境或消息……”话剧与影像结合，利用虚实相生的联系，打破舞台时空的局限，这种手段陆帕在《假面玛丽莲》中也曾使用，电影资料中影像和戏剧场景产生勾连。

银幕上开来了一辆车，走下来三个女孩，她们“穿过”投影的门，出现在舞台上，她们和酗酒者莫非发生对话，又把他拉走，他们再度穿越这个通道，在银幕上驾车扬长而去。莫非身边的外国女记者，也想穿越这个门，但她突然意识到，这个门可能并不存在……

以电影为背景的戏剧，陆帕“遵照”了史铁生的想法。银幕上的语言，令著名编剧过士行感受到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的作品风格。“戏剧在表现人的意识活动时，如何在表演之外借助影像

完成得更好，我看到了这种尝试带来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内导演）没有那么好的耐心，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展现人的意识活动。我们更注重的是故事和事件，注重的是写实的東西，但对展现人物的内心缺乏手段。”

而“外国女记者”是陆帕原创的角色，她试图和莫非展开对话，他们看似在交流，实际却被一堵墙分隔在两个世界，这是真实世界中，人类灵魂无法沟通的残酷现实。“孤独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世界的事。人类只有在交流不通时才格外孤独。”

是陆帕慢，还是观众的心理节奏快？

近年来，陆帕导演的作品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也把波兰戏剧带到

了国人面前，但陆帕自己坦言，对中国戏剧不太了解。陆帕也存在导演方法上的局限，不给他足够时间，就没法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讲述清楚，他的戏剧节奏决定了他戏剧的长短。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国观众理解上的难度。“然而，陆帕的作品却可以在泛娱乐化的时代让我们重新思考戏剧的价值。”黄昌勇认为，它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有意思的是，《酗酒者莫非》首演后，大部分青年观众都非常喜欢，甚至没感到五小时的漫长。“有人认为该剧节奏太慢，这个我不太认同。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坐不住，什么都要讲得快，成为了时间的奴隶。不是陆帕慢，而是我们的心理节奏太快了。”黄昌勇说。

要说《酗酒者莫非》展现的是一段孤独者的心灵史，没有人会质疑。它本身具有高度象征性，“酗酒者”可以是

莫非，可以是A，可以是任何一个你我他，年轻的心或许更能体会到这种徘徊在断崖边的哀伤，那种“死后七天，才被人发现”的孤独。

很多观众表示，在逐渐走进酗酒者莫非的过程中，史铁生本人的影子也慢慢浮现。事实上，观众的直觉并没有错。在创作中，陆帕试图把史铁生本人的精神轨迹和文学创作，也融入酗酒者对生命的呐喊之中。改编前，他专门请人翻译了一批史铁生的作品，深入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

过士行形象地称陆帕为“米卢式”的戏剧导演，米卢注重建设队员的心态，而非仅仅是足球。在戏剧界，陆帕的风格同样如此，他很看重和演员的合作。来到中国后，他和演员们在一起待了三个月，带给他们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训练和建议，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面有信任、有理解、有不舍。

《酗酒者莫非》首演的现场气氛热烈，但对陆帕而言，这五小时可能是和史铁生最心灵相通的孤独时光。“我想铁生如果还活着的话，会以很宽容的眼光来看这个戏的，因为陆帕把他的想法实现了。”过士行说，《酗酒者莫非》是中外两位大师共同完成的创举，“这个戏将走向全球，在那些地方，铁生也会遇到全球。”